

太平天国史论文选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

太平天国史论文选 下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宁 成 春

太平天国史论文选

(1949—1978年)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6.5印张 1,151,000字

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书号 11002·523 定价(上下册)4.55元

太平天国与儒家思想

胡 思 庸

（一）问题的提出

太平天国革命之所以不愧为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不但因为它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进行了空前伟大的革命斗争，而且它还破天荒地建立了一套思想体系，以旧时代农民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形式，提出了反侵略的民族思想、反封建的平等思想、乃至解除一切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小农乌托邦思想。在文化思想战线上，成为近代民主主义革命思潮的前驱。

作为中国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代表的儒家思想，一方面，在两千年来一直被地主阶级当作奴役人民心灵的重要工具，所以当历史进入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后，政治战线上的反封建斗争就必然要求发展为思想战线上的反孔教斗争；而另一方面，儒家在长期发展中也遗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某些合理的思想成分，又由于它支配人心的广泛和悠久，所以，一种新思想在刚刚产生的时候，就不可能回避这个前提，必须根据它作为“由以出发的一定思想资料”。^①这样，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对于儒家思想就形成了又反对、又吸收，有时猛烈斗争、有时又力求适应的复杂矛盾关系。我们如果正确理解了这场斗争，就能够从中吸取许多现实的有益

^①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第496页。

的教训。

关于太平天国和儒家思想的关系问题，最初人们的注意，是从太平天国《天条书》、《太平诏书》等书各有两种不同的版本而引起的。即：一种版本，引证了许多儒家的典训名言，另一种版本则缺少上述内容。究竟哪一种是初刻的原本呢？有人认为，凡不引据儒家经典而宗教意味特浓的为初刻本，凡引据儒家经典而富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则为改正重刻本。从而断定：“太平诸人思想之变化颇有足征者：当其初起，惟以尊上帝拜基督为事，举中国一切之圣经贤传胥毁弃之”；到后来，由于社会上传统习俗的阻力太大，“不得不翻然变计”，加入儒家典训名言，谋求调和。^①但是大多数人经过周密研究以后，否定了这种说法，而认为凡引据儒家经典的为初刻本，反之，凡缺少上述内容的，则为经过删削改定的重刻本。从而得出以下结论：

“天王洪秀全本儒生，久受中国传统思想的熏陶，虽以耶稣教发动革命，而其初所认识的教义仅限于梁阿发的《劝世良言》，故当时所著述的多援用儒家思想与术语，不能出其范围。其后起义建国，急于宣传，而军事倥偬，未及删改，遽尔付刻。及定都天京，草创渐定，‘万样更新’，于是乃有删书之举，定一尊于上帝，以谋宗教上思想上的统一化，于是遂排斥儒教。”^②上述的第二种结论是建立在坚实的史料考据基础上的，是正确的。但是，应该指出：它只是相对地说明了洪秀全一个人的思想变化，远远不能概括整个太平天国思想的情况，因而不够全面，并且把问题简单化了。唯其如此，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对于儒家思想的斗争和利用——进一步说，也就是对于一般文化遗产的批判和继承——

① 《太平诏书跋》（肖一山），见《太平天国丛书》第1集第1册。

② 罗尔纲：《太平天国现存经籍考》，见《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第51页。

所作的尝试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似乎还缺乏应有的探讨。

(二) 洪秀全早期的儒家色彩及其评价

洪秀全在拜上帝教的初创时期,朝气方盛,力图把西方基督教的一神论、中国农民战争中(尤其是天地会)传统的革命理想和儒家学说中的优良部分,吸收融汇,创为教义,使之适合于中国农民斗争的要求。他那个时候,对于“孔孟先儒”还是十分尊重的。他在《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百正歌》以及《天条书》等著作里,都表现出儒家思想的强烈影响,大量引据孔孟格言和儒家典籍,来建立上帝教的哲学基础和道德纪律的规范。《太平诏书》里面劈头第一句话就是董仲舒的名言:“道之大原出于天”,把封建地主阶级的神道设教加以内容的改造,使之成为农民的教义服务,这不能不说是“化腐朽为神奇”吧。而儒家所标榜的“古圣先贤”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乃至颜回、孟轲等人,在洪秀全的初期著作里,都是可以尊敬的人物。“颜回好学不二过”、“禹稷忧溺饥”、“汤武伐暴除残”^①……这都是学习的榜样。而且,这些人不但是世俗的圣贤,似乎也是天国的先知,他们的灵魂都到了天堂:

“周文孔丘身能正,陟降灵魂在帝旁。”^②

按:洪秀全这两句话,乃来自于《诗经》: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③

这样,洪秀全根据古老的儒家经典,肯定了孔子文王这一类的“圣贤”,其灵魂都在上帝的身旁上下翱翔。对于他们的尊重,可想

① 《原道救世歌》及《原道醒世训》:见《太平天国印书》(下简称《印书》)第1册,《太平诏书》,第2页及第9页。

② 《原道救世歌》,见《印书》第1册,《太平诏书》,第6页。

③ 《诗·大雅·文王》。

而知。

有些同志曾认为：“洪秀全著述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作品……他把地主阶级在精神上统治农民的一切神仙菩萨、妖魔鬼怪和孔孟先儒都总称之谓阎罗妖”，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又有同志说：“洪秀全首先把他书塾中的孔子牌位打碎……中国封建社会的‘至圣’孔子竟被看做邪神，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破天荒的大事。”^①这也是一种臆测之辞。当然，洪秀全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以后，不能说不对孔子神一般的权威崇拜发生一点动摇，但是在他的早期言行里，并没有厚非孔子。他打碎孔子牌位，虽然在客观上是对孔子威权的一个公开打击，但是完全可以肯定，他丝毫没有把孔子看做“邪神”（直到太平天国晚期，始终也没有把孔子看做邪神），而只是因为反对敬拜偶像。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举出几方面的证据来说明：

首先，洪秀全打碎书塾中的孔子牌位，是在一八四三年的事情，如果说这时他已把孔子当作“邪神”，那末，他在一八四五——四六年所写成的《太平诏书》，反而对孔孟先儒表示尊崇，这是无论如何都解释不通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反对偶像。

太平天国反对偶像最为彻底，连天主教堂的耶稣、玛利亚的“圣像”也在摧毁之列。这些事实外人颇有记载，亲身参加过太平天国革命的呤喇(Lin Le)也说：

“太平军在扫除偶像方面是十分严厉的，他们在内地曾经屡次与罗马天主教所设立的各种机构发生冲突。”^②
偶像不能代表神，只是一堆“木石泥团纸画”，这种道理，洪秀全在《原道觉世训》中有过明确的解释，此处无须转述；值得注意的是，

①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1957年增订本，第105页。

② 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译本）上册，第128页。又，C. L. Wolseley: 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Chap. XIV. 亦有同样记载。

他在该文中这样说：

“尔凡人所立各偶像，其或有道德者，既升天堂久矣，何曾在人间受享？”^①

这里，他所谓的“有道德”“既升天堂久矣”的人物，虽未指出名字，但根据洪仁玕的追记，洪秀全所指必为尧舜孔孟无疑。考洪仁玕在其《自述》里，曾追记洪秀全在两广宣传反对偶像的讲词是：

“即古圣贤虽有功德于人，不独念伊功，且当实力效法，何世人一拜便了？竟不学尧舜孔孟之德，独冒为其徒，可乎？”^②由此可见，洪秀全虽然打碎了孔子牌位，但他并没有否定孔孟作为人间的“古圣先贤”的地位，更没有以孔子为邪神的意思。

总之，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充满着儒家气味，例证甚多，无须一一列举。问题在于：洪秀全从儒家那里主要地吸取了哪些思想？并且这些儒家的思想资料对于上帝教义的创立和农民的革命斗争有着什么意义？起了什么作用呢？

首先，洪秀全借取了儒家经书中“天”的概念，来论证他的上帝的存在，认为古儒所说的“天”就是上帝。例如前面所引述过的“道之大原出于天”，这里的“天”字已被洪秀全用作独一真神上帝的别名了。又如他论证人的灵魂乃上帝所赋予：

“若自人灵魂论，其各灵魂从何以生，从何以出？皆禀皇上帝一元之气以生以出。所谓一本散为万殊，万殊总归一本。孔伋曰：天命之谓性。《诗》曰：天生蒸民。《书》曰：天降下民。——昭昭简编，洵不爽也。”^③

在儒家的古代经典中，“天”的涵义有许多就是指有人格有意志的

① 《印书》，第1册，《太平诏书》，第18页。

② 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下简称《丛刊》）第2册，第849—850页，《洪仁玕自述》。

③ 《原道醒世训》，见《印书》第1册。

最高神，洪秀全就利用这一点，把它和基督教的上帝等同起来，从而认为上帝造人，载在儒典。洪秀全不但利用儒家的经典论证上帝的存在，而且还利用儒家经典来论证“阎罗妖”只是一个魔鬼，而不是掌握人之生死的神：

“独不思注生死一事，岂是等闲？既不是等闲，宜为中国番国各前圣所论及，且笔于书，以传后世。而于今历考中国番国各前圣所论及，且笔于书以传后世者，只说天生天降，皇上帝生养保佑人，未尝说及阎罗妖也；只说死生有命，亦是命于皇上帝已耳，毫无关于阎罗妖也……”

在他看来，中国古代本来也是崇信上帝的。他根据《诗》《书》《易》上关于“昭事上帝”、“敢祗承上帝”等等词句，认为颡项、商汤、周文、周武这些古代的君王及其臣民，都是崇信上帝的；所以说：“盘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体敬皇天。”不过自从秦汉等朝专制帝王“魔鬼入心”、求仙拜佛以后，才中断了原来的信仰，使中国“差入鬼路，致被阎罗妖所捉”。^①

从表面上看，洪秀全利用儒家古代典籍上“天”、“帝”、“上帝”等字句以比附基督教的上帝，颇与明清间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的手法相同。^②但是我们要知道：整个的《太平诏书》都是在一八四五——四六年写成的，这时洪秀全还没有跟从美国牧师罗考全学习耶稣教义，连“圣经”也还不曾寓目，所以他不大可能读过明清之间耶稣会士们所写的《天主实义》一类的书。虽然在这点上洪秀全和他们有某些无意的偶合，但两者却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利玛窦等人那里，比附儒经是为了便于宗教的欺骗，而洪秀全比附儒经，

① 《天条书》及《原道救世歌》。

② 参看利玛窦：《天主实义》；又参看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第27章。

却是为了假托古人之名以便于革命的号召；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不妨名之为“革命的托古改制”。

所以，洪秀全宣布：信仰上帝倒不是追随西方——“从番”，而毋宁说是复古。（石达开的白龙洞题壁诗也说：“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当然，“复古”也罢，“从番”也罢，这都不过是一种形式；事实上洪秀全的上帝，既不是殷周先民所崇敬的最高神，也不是欧美教士所传来的耶和華，而只是农民心目中“斩邪留正”的宝剑。这就是洪秀全所谓的：“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①

这把上帝的宝剑，在宗教意义上，就是要诛尽一切妖魔阎罗，也就是摧毁当前统治人民心灵的神佛威权，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

“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②

宗教是被颠倒了现实。如果透过宗教的帷幕来看它的社会政治意义，上帝的宝剑实际上是指向人间的皇帝。根据最古老的儒家经典，“帝”这个字只是殷周先民对于最高神的称呼，后世的专制君王为了表示自己的尊贵，便篡窃了这个称呼，也自称起“帝”来。因此洪秀全写道：

“皇上帝乃是帝也。虽世间之主，称王足矣，岂容一毫僭越于其间哉！……耶稣尚不得称帝，他是何人，敢藐称帝者乎？

只见其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③

这样，在复古的名义下，历代的帝王，当然包括清朝皇帝在内，便被判决为罪魁祸首而抛到地狱里面。

这种思想的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它用“借古喻今”的形式尖

① 洪仁玕：《钦定军次实录》及《自述》均引有此诗。

② 《毛泽东选集》，第31页。

③ 见《原道觉世训》。

锐地指控了现实社会的黑暗：“乖漓浇薄”、“陵夺斗杀”、“强犯弱、众暴寡”。那末，应该怎么办呢？洪秀全指出：

“遐想唐虞三代之世，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举选尚德。”^①

接着，他整段地抄引了“孔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一篇话，并且慨叹今不如古：那种黄金般的三代治世，“而今尚可望哉！”

“天下为公”的三代大同说，本来是古代个别儒家的一种朦胧理想。但由于儒家思想的传统方向总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所以这种大同思想的微粒只能偶然地萤光一闪，随即被淹没在历代儒家体系的苍茫烟海里面。而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却利用了这一古代思想资料，表达了农民摆脱封建剥削和压迫的现实要求。在以后的几年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农民的土地要求又进一步和大同思想结合起来，并且采用了《周官》上的编制方法，发展成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正是运用这一纲领，动员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组织了政权和军队，对封建制度进行了空前沉重的打击，把单纯农民战争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当然，应该指出：《天朝田亩制度》的真正思想根源，是从农民斗争的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农民要求土地，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借用了儒家古圣先贤和“上帝”的语言，使农民的呼喊带有了神圣的性质。因此就可以明白，洪秀全的手虽然指向过去，而脚跟却立于现在，步伐却跨向未来。

根据同样的方法，洪秀全在提出农民的人身平等的要求时，也借取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儒家典训的支持，并且结合某些基督

^① 见《原道醒世训》。

教义,形成太平天国的平等理论:“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儒家典训本来是维护封建等级名分的武器,然而一旦被农民夺取过来,就转化为它的反面,破坏了封建统治秩序。所以刽子手曾国藩咬牙切齿地说: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①

曾国藩的号哭咒骂,正说明了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打中了封建制度的要害之处。《天朝田亩制度》否定了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这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原则又否定了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这是封建制度的政治基础。充分体现了我国农民伟大的革命勇气和创造精神。

但是,还应该指出,在接受、利用儒家思想的同时,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物却缺乏认真的批判态度(儒家到底是封建主义的代言人呵),许多消极和阴暗的东西,也被同时因袭下来了。

例如,儒家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思想,有许多也被移植到上帝教义里面。早在一八三七年,洪秀全就曾经“预诏”：“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②在《太平诏书》里,他提倡颜回的“非礼四勿”,主张“《孝经》当明”;等等。当然,洪秀全所谓的“君不君、臣不臣……”是对清朝统治体系的合法性的否定;而他所谓的“总要君君、臣臣……”则具有要求建立新政权、新秩序的革命意义。但是,

① 曾国藩:《讨粤匪檄》,见《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3。

② 《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

必须承认，它终究还没有突破儒家封建伦理道德思想的局限。这种封建的伦理道德思想，在冯云山那里表现的更突出，他在《幼学诗》^①里，不厌其详地划定人们所应遵守的伦理规范，特别强调男尊女卑，什么“夫道本于刚”、“妻道在三从”，以及“牝鸡无晨”之类的说教。正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洪、冯二人共同制定了等级森严、繁琐无聊的《太平礼制》。这显然和他们所曾经提出来的平等原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

又如，儒家的“天命”思想，本来就是封建统治者束缚人民手脚的一条绳索，洪秀全却把它承袭过来，并屡加强调。《论语》上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易传》上说：“乐天知命故不忧”；^②洪秀全也说：“富贵在天生死命”、“小富由勤大富命”、“总之贫富天排定”、“安贫知命”、“乐夫天命”^③等等；甚至在人人必须严格遵守的十款天条里，也写上了“贫穷富贵皆皇上帝排定”的原则。这些提法不但会冲淡人民的革命热情，而且给贫富差别找到了天上的根据，给私有财产涂上了一道尊严的圣光，和《天朝田亩制度》的伟大革命精神直接对立。

所有这些矛盾现象应该如何理解呢？从阶级特点上看，这正反映了农民阶级在生产中所处的矛盾地位和由此产生的矛盾心理；从思想史的角度上看，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明的：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④

① 汪士铎：《乙丙日记》说：“冯云山，死于永安，三字经、幼学诗、官制、礼制，多出其手。”（文芸阁版，卷3，第32页）当为可信。

② 《论语·颜渊》；《易·系辞上》。

③ 《原道救世歌》。

④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

(三) 论“排儒”

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精神武器的儒家思想,无论如何,是和农民的要求在本质上格格不入的;尤其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这种思想就和农民的民主主义革命要求更加水火不容。再加上两汉以来的二千年间,儒家已经不仅是一个统治的学派,而且简直被弄成了一种宗教,“至圣先师”孔子的威权凌驾于众多仙神之上,这也和上帝教“独一真神”的威权势不并存。“不破不立”,随着洪秀全圣经知识的增加和太平天国革命形势的飞跃发展,特别是随着思想战线斗争的需要,对儒家的排斥,就在所必行了。

本来,早在一八三七年洪秀全读到《劝世良言》——就是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以后,他就不可能不意识到儒家思想和耶稣教义的某些矛盾。据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说,洪秀全病中所见种种天堂异象,其中就有上帝斥责孔子的话:

“秀全又闻衣皂袍之老人(按即上帝)斥责孔子,谓其于经书中不曾发挥真理。孔子似自愧而自认其罪。”

虽然如此,这一段话只是一种密谈,从未公诸于世,^①而从洪秀全以后的著作来看,正如前面所说过的,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儒家色彩,并对孔子怀着温和的敬意。

但是,到了定都天京前后就不同了。温和的敬意变成了大胆的藐视和嘲弄。上帝斥责孔子的故事便广泛流传开来。例如:

“孔某向本在天堂,忽逃下凡间,变妖惑人。所以天父大怒,今已捉上高天,罚他种菜园了。”^②

① 按《太平天国起义记》乃是洪秀全的族弟、心腹洪仁玕对瑞典牧师韩山文(Theodore Hamburg)的密谈。

②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贼吃语》。按,这类故事当时流传很广,如鲁叔容:《虎口日记》、栲园退叟:《盾鼻随闻录》等,皆有记载。

这种藐视圣贤的心理，甚至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也有所表现。一个扬州的地主分子恨恨地写道：

“虽衣冠中人，并献媚（太平军）而戏侮圣经。……某孝廉因陷于贼，……尝戏改《论语》‘殷有三仁’为‘二仁’。有询之者，云：‘微子变妖去矣’。侮圣人之言，莫此为甚。”^①

到一八六二年，太平天国的官修史书更以大大夸张了的形式将洪秀全的天堂异梦公布出来：

“天父上主皇上帝……又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天父上主皇上帝……指主（即指洪秀全）看曰：‘……这是孔丘所遗传之书，即是尔在凡间所读之书，此书甚多差谬，连尔读之，亦被其书教坏了。’天父上主皇上帝因责孔丘曰：‘尔因何这样教人糊涂了事，致凡人不识朕，尔声名反大过于朕乎？’孔丘始则强辩，终则默想无辞。天兄基督亦责备孔丘曰：‘尔造出这样书教人，连朕胞弟读尔书亦被尔书教坏了！’众天使亦尽归咎他；主亦斥孔丘曰：‘尔作出这样书教人，尔这样会作书乎？’孔丘见高天人人归咎他，他便私逃下天，欲与妖魔头偕走。天父上主皇上帝即差主同天使追孔丘，将孔丘捆绑解见天父上主皇上帝；天父上主皇上帝怒甚，命天使鞭挞他。孔丘跪在天兄基督前再三讨饶，鞭挞甚多，孔丘哀求不已。天父上主皇上帝乃念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准他下凡。”^②

所有这些奇异的故事，代表了太平天国对孔子威权的践踏和丑化，其意义是决不可轻估的。这与“五四”以后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曾经出现的《子见南子》之类的戏剧，^③颇有异曲同工之

① 臧穀：《扬州劫余小志》。

② 《太平天日》，见《丛刊》第2册，第636页。

③ 参看《鲁迅全集》第7卷，《关于子见南子》，1929年。

妙。而前者比后者还要早几十年。

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太平军所到之处对于孔庙、孔像、孔子“木主”，自然更加毫不留情地予以摧毁。对于儒家典籍，则连同诸子百家等书一起，一概被宣布为“妖书邪说”，尽行焚除，不准买卖藏读。各地科举考试的题目，也只以有关上帝教义、经过“旨准颁行”的诏书为限，严禁用儒家经典为题，违者以变妖论处。例如天试状元武立勋，“东贼使往安庆为正掌试官，因出五经题，贼怒，目为妖，降为伍。”^①

与厉行“排儒”的同时，洪秀全又将自己过去的著作《太平诏书》《天条书》等大大删改，凡其中引据儒家经典或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文句，削除的削除，改变的改变，以求统一于上帝教义，“定一尊于上帝”。

这些措施和行动，象狂飙，象霹雳，对于几千年来束缚人心的陈腐教条，进行了有力的革命扫荡。刽子手曾国藩如丧考妣地号啕着说：“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②正足以说明太平天国对于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斗争和打击，是自古以来农民战争中最为尖锐，最为深刻的。在一次又一次的农民战争中，赤眉黄巾也好，李自成张献忠也好，都没有设想到对于孔子和“纲常名教”进行这样大胆的坚决的打击。

为什么太平天国革命和前此的农民战争有如此的不同呢？为什么它能够给自己提出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儒家思想的任务呢？马克思曾经教导说：

“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③

①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粤逆名目略》。见《丛刊》第4册，第679页。

② 曾国藩：《讨粤匪檄》。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第341页。

发生在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太平天国革命，虽然还是一次单纯的农民战争，但是由于中国已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从革命性质上来说，这个时代的任何革命，包括太平天国革命在内，“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①再则，虽然在那时候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还没有产生，但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自然经济的解体，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物质条件已经在形成过程之中，所以，太平天国革命的内容，就必然不能和以往的农民战争一样，它不但担负了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任务，而且在反对国内封建主义的斗争中，除了能够提出《天朝田亩制度》那样的革命纲领和《资政新篇》那样的进步方案以外，还能够意识形态的领域内进行这样空前深刻的排击儒家思想的斗争。

太平天国“排儒”、“排佛”对于人民的精神世界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下面是地主士人和湘军特务的记载：

“无识愚氓，见彼所为，谓天壤间无复有鬼神。爰敢肆无忌惮，助之为虐。其死心为彼，甘蹈白刃者以此。”^②

“贼虽无邪术，然虏人纯用换移心肠之法。……换‘好人’为‘坏人’，换‘坏人’为‘极坏人’。故凡从贼稍久逃出之难民，无不眼光闪烁不定，出言妄诞，视世事无可当意。于伦常义理及绳趋墨步之言行，询之皆如隔世。视我官吏若甚卑，不及贼目之尊贵，毫无畏敬之意。”^③

在太平天国灭亡以后，美国浸礼会的传教士晏玛太（Rev. M. T. Yates）还发表演讲说：

“（中国）全国在政治上及宗教上均已颓坏了。人民陷于

① 《毛泽东选集》，第523页。

② 陈徽言：《武昌纪事》，见《丛刊》第4册，第599页。

③ 《贼情汇纂》卷12，见《丛刊》第3册，第327页。